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直南地区农民革命动员研究

马忠坤

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4

摘要: 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土地革命时期, 中共直南地区的党组织通过利益保障优先, 减轻经济负担; 建立农民组织, 凝聚农民力量; 加强宣传教育, 启发农民思想等方法调动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在具有针对性、广泛性、融合性特点的动员工作下, 中共直南地区的党组织维护了农民的利益, 促进了农民的思想解放。党在直南地区的农民革命动员工作也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日战争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关键词: 直南地区; 农民工作; 革命动员

0 引言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 国民革命不会成功”^[1]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强调“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 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 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 都是不可能的”^[2]这表明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土地革命时期, 中共直南地区党组织深入农村, 采取多种方式动员农民参加革命。一次次的革命斗争既锻炼了党组织的能力, 又维护了农民的利益。

1 中共直南地区党组织开展农民革命动员的背景

直南, 即直隶南部。直隶, 旧省名。明朝时, 称直接隶属于京师的地区为直隶, 相当今北京、天津两市和距北京较近的河北省大部, 河南、山东省的小部地区。本文所指的“直南”其范围大体是河北省邢台以南, 黄河以北, 平汉线以东, 山东省以西的原直隶省南部地区。^[3]

直南地区气候温和, 物产丰富, 盛产小麦、棉花及玉米等重要农产品。在农村, 封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 除个别由地主雇工经营外, 一般把土地分成若干小块租佃给无地或少地的佃农耕种, 收取地租。如, 土地改革前, 濮阳县“大中小地主占总农户的20%以下, 却占耕地的70%以上”“贫下中农占总人口的45%以上, 只占耕地25%”; 范县“地主富农占总农户的5%左右, 占有耕地的30%左右, 占50%的贫下中农, 则部分或全部依靠租种地主、富农土地维持生计。”^[4]地主凭借地租、雇工方式剥削农民。此外, 还有名目繁多的附加税等额外剥削。在沉重的地租、高利贷剥削下, 广大农民过着衣不暖体、

食不果腹的贫困生活, 蕴含着巨大的革命性。

大革命失败后, 党的组织虽遭到破坏, 有过低潮, 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到, 被征服, 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 揩干净身上的血迹, 掩埋好同伴的尸首, 他们又继续战斗了。”^[5]1927年8月7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临时中央政治局8月9日的会议上, 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 整顿顺直(顺, 今北京, 曾名顺天府, 直, 直隶省)山东、山西及内蒙古等地党组织。在《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强调“各级党部都应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 以扩大党的影响(如组织各式各样的学生团体, 小商人团体, 妇女团体, 俱乐部等类之组织, 利用尚未被封之工会等, 在这些组织之中组织党团, 受党的严密的指导, 各种伪国民党的下级党部之下, 亦是如此)。但是即使在最公开的条件之下亦应有秘密组织及工作, 这是现时环境中最主要的职任。”^[6]9月上旬, 北方局成立, 所属各地党组织积极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在“八·七”会议指导下, 直南地区党组织继续发展壮大, 并由分散的支部、特支发展成县委、中心县委。经过各地党组织和党员的艰苦工作, 直南党组织又逐渐恢复并有所发展, 以濮阳为例, 1932年, 濮阳城南一带以桑村小学为中心, 两门、姚家、赵庄、八里庄、刘邢曹等地都有了党组织。到1933年, 濮阳以南一直到和滑县交界处, 99个村有了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7]这为开展后续动员工作打下基础。

2 直南地区党组织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方法

为动员广大农民投身革命斗争, 直南地区党组织立足农民切身利益与现实需求, 多措并举开展工作。坚持利益保障优先, 着力减轻经济负担, 通过抵制苛捐杂税等举措, 解决农民

最迫切的生存难题,让农民切实感受到革命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同时,积极建立健全农民组织,把分散的农民团结起来,凝聚起反抗压迫、追求解放的强大力量。在此基础上,加强宣传教育,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革命道理,揭露剥削本质,启发农民阶级觉悟,引导农民主动参加革命。

2.1 利益保障优先,减轻经济负担

多年的混战,特别是蒋、冯、阎之间发生的中原大战加之地方豪强的压迫剥削,给直南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各种税目、差役增多。为把繁重的差役转嫁到农民身上,磁县的租佃惯例是“地主收租,交土地税;田间小秋作物(糙稻和地边畦边蔬菜)归佃户收获,差役由佃农支应,当地叫作‘插耨应差’”。^[8]即谁插耨谁应差。佃户租种地主的土地,一切差役都由佃户负担,地主只收租,不应差役。插耨应差增加了佃农的负担。1929年,磁县党组织散发传单,揭露“插耨应差”的剥削本质,领导甘草营、八里铺一带的农民反对“插耨应差”,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响应。1930年1月19日,由共产党员唐寿山、王合等带领小营店、耒村等8个村庄500多名农民到八里铺参加大会,声援反对“插耨应差”的斗争。这次斗争有力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

1931年冬,直南特委在肥乡开展年关斗争,提出“抗债、抗粮、抗捐、帮助农民过年关”的口号。县委发动党员包村包片写标语,大搞“三抗宣传”。全县学校、十字路口、街上等贴上红绿标语,引起较大震动。粉房头一户地主答应因斗争损毁的房子不用管,利钱不要了,债缓偿。这让贫苦农民过了个较好的年。在农村,坟田、庙田、学田虽是一村或一族共有,但多由村里的地主、富户经营。“三田”收入用于公众事业甚少,经营人多年不报帐,装进自己的腰包。1933年春,高家寨地主韩荣耕种庙田五十亩,收入帐目多年不公开,群众意见很大。了解情况后,党支部带领农民进行斗争,取得了五十余亩庙田的使用权。高家寨、逯家堡斗争之后,肥乡西区各村的夺“三田”斗争也普遍开展起来。^[9]

除此之外,党在直南地区领导农民进行了一系列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如“滑县抗花生税斗争”,共产党员聂真和胡敬一以滑县农民协会的名义把农民组织起来,集合三千多名农民召开抗花生税的请愿大会,进城抗税。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税务局”“取消花生税”等口号,迫使当局取消花生税。^[10]通过一次次的经济斗争,广大贫苦农民的经济

负担有所减轻,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农民积极参与革命,产生较好的动员效应。

2.2 建立农民组织,凝聚农民力量

传统社会中,农民多从事自给自足、封闭的农业生产。在农村,各种事务多为乡绅把持,穷苦农民的利益得不到真正地维护,农民力量薄弱难以抗衡地主豪强。因此,党领导农民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建立为广大穷苦农民发声的各种农民组织,发挥其在维护农民利益,党与农民之间联系纽带的作用。

时属大名县的蔡小庄几家地主成立“堆金会”,放高利贷剥削农民。党支部便发动群众组织了“甘礼会”,提出欠地主的债一概不还。“甘礼会”人多心齐,使地主们毫无办法。^[11]在直南沙区,陈少敏和张增敬等了解群众缺粮情况,组织“好人会”,“讨饭队”,由党员带领向大户借粮,或趁黑夜进行武装抢秋。张增敬化装成农民,带着几十名会员到王告村的一个地主家借了一批粮食。每人分了二三十斤,使贫苦农民过了个好年。陈少敏还在沙区发动群众与反动宗教势力进行斗争,成立了“叩头会”。仅千口村参加的就有关党员40人、团员30人、群众200多人。在会员中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帝国主义、国民党利用教会压迫剥削穷人的罪行。^[12]

南乐县“穷人会”针对地主的铲麦茬斗争。1928年麦收,党支部领导“穷人会”开展了铲麦茬斗争。无地或少地农民,由于烧柴困难,麦收后主要靠铲地主家割麦后剩在地里的麦茬为炊。地主自己不铲,也不准穷人铲。每年这时,地主会派人看守,抓住铲麦茬的穷人非打即罚。党支部便组织“穷人会”,商定不管谁家的麦茬,谁铲归谁。党支部让“穷人会”出面号召群众铲地主家的麦茬。地主像往年一样阻止穷人铲麦茬时,穷人聚众与他们讲理说:“麦子是我们穷人种,穷人管、穷人收,而收获的粮食入你们的粮囤,难道我们铲麦茬就不行?这麦茬我们是非铲不可!”斗争的结果是农民获得了珍贵的过冬燃料。^[13]

除此之外,直南地区的党组织通过各式各样的组织将广大农民凝聚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斗争合力,为维护其利益而英勇斗争。这有效改变了以往农民力量薄弱的局面。党的领导也为农民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主心骨。

2.3 加强宣传教育,启发农民思想

除在物质、组织方面的动员工作外,直南地区的党组织也十分重视在思想层面启发农民,通过各种方式教育农民,促进其思想解放。如,濮阳县千口、化村、井店等村开办农民夜校。王从吾、王卓如等当地党员担任夜校教员,教

农民识字。同时,积极向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如《平民夜校读本》涉及:“人、工人、农民;工人苦、农民苦、出尽力气不能享福;是谁剥削我们,是谁压迫我们?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放下锄头都饿死;拿起锄头反而受欺受穷。我们要铲除这个不合理的世界,联合起来开展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14]这些内容对于深受封建思想压迫的农民而言,无疑深受震撼。

大名县的“工农小报”内容丰富。有国内外的斗争形势,有省县的斗争情况和胜利消息,半月出一次,共出八、九期,送到各党支部,鼓励党员的斗争情绪。在宣传上打破老一套的宣传方法,把宣传内容编成顺口溜,对工人、农民、学生、商人都有不同的宣传内容。如顺口溜:“贫农们,真可怜,起早到晚不得闲,辘辘把上手磨烂,一年不挣几个钱。”“地主们,真可恨,农民们,太可怜”。宣传内容根据农民、工人的实际情况和社会不平等的情况进行编写。通过宣传讲解,赢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赞扬。^[15]

3 直南地区党组织农民革命动员工作的特点

直南地区党组织为动员农民参加革命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特点的措施,其特点有针对性、广泛性、融合性。

3.1 针对性

调动农民参加革命,采取何种方法很重要。正确的方法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直南地区党组织在发动盐民进行斗争时便采取了针对性的宣传教育方式“农民种地,盐民做盐,都是合法的。农民有好地,就指望种庄稼过活;盐民无好地,就依靠做盐谋生。对衙吏家属,我们借“民生主义”进行宣传:盐民做盐正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盐巡根本不应干涉。盐民不做盐就活不下去,要想活下去,就得团结起来,反对盐巡的无理干涉。对天主教徒,我们依靠其中的积极分子,以对魔鬼(盐巡)作斗争进行发动;对多数盐民,以街道和村庄为单位,用滚雪球的办法,扎根串连,逐层发动,形成核心。”^[16]针对性的宣传方式使盐民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为进一步的斗争做出了良好的动员工作。

3.2 广泛性

直南地区的党组织把斗争动员的范围扩展到单纯的土地负担之外。直南地区瓷土资源丰富,瓷器窑较多,瓷器生产、运输兴盛。由此

衍生出一种小车运瓷器的职业,从事推车运瓷货的多为无地少地的农民。窑主瓷商趁机巧立名目剥削工人。如从“单扣底”到“双扣底”,将原由资本家承担的“药货钱”转嫁给小车工人承担等,发给小车工人的工资不按市价折合,使小车工人每人吃亏一吊钱。(“双扣底”指一百铜元扣两个。“药货钱,”药货即用草绳捆碗,药货钱就是每一车货,推车工人拿出一吊钱。这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一种方法)^[17]直南特委得知小车工的遭遇后,立即派磁县中心县委书记王维纲组织领导小车工人斗争,组织小车社号召工人罢工,编写、散发《敬告民众书》,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斗争的结果是小车工人胜利,资本家取消了不合理的要求。除小车工人外,党还领导了盐民斗争。直南地区盛产硝盐,濮阳、内黄、滑县等县的农民依靠刮土熬盐作为家庭副业以充实收入。1932年,党领导濮阳县三千盐民“驱逐盐务缉私队”(简称盐巡)出境的斗争,迫使濮阳县长同意“盐巡退出濮阳,准许盐民继续做盐”的条件。^[18]直南地区的党组织深入农村,了解农民真实处境,从多方面维护农民利益,动员广大农民参加革命。

3.3 融合性

党组织建设与农民运动深度融合。在动员运动中发展党员,在斗争积极分子中选拔培养党员,将农民组织中的优秀分子吸收进党组织,使其成为连接党与群众的核心纽带,使党组织真正扎根农村土壤。如在党领导濮阳和各县盐民斗争中,濮阳县的杨进才、内黄县的李聚祥、东明县的支悦刚等都是盐民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在带领盐民反压迫的过程中,支持党组织的领导,认同党的革命纲领,经组织考察培养后入党。杨进才加入党组织后又进入中共濮阳中心县委。这些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党员既熟悉农村实际,又坚定拥护革命。他们在政府、团体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成为落实党的政策,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的核心力量,让党组织真正成为农民运动的领导核心。到1935年,直南地区的党组织形成了一支具有影响力的队伍,共有党团员5000多人,遍及冀鲁豫边的20余县。其中以濮阳、内黄为最多,1934年濮阳县就有8个区委,99个支部,1280名党、团员。^[19]

4 结语

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土地革命期间,为了动员亿万农民支持革命,党通过建立农民组织、多样化的宣传教育等方式与农民产生密切联系,逐步打牢群众基础。中共直南地区的党组织立足实际,

突出重点,围绕动员农民支持革命的主题,采取利益保障优先,减轻经济负担;建立农民组织,凝聚农民力量;宣传教育,启发农民思想等方法调动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在发挥农民主体性的基础上,对农民进行改造,使之逐

步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党组织的农民革命动员工作体现出针对性、广泛性、融合性等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既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发展,调动了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也推动了直南地区党群关系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页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39页
- [3] 孙建玲《中共直南——冀鲁豫地区前期革命史》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第1页
- [4] 濮阳市土地管理局编《濮阳市土地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7页
- [5]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6页
- [6]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03页
- [7] 谢忠厚等《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宣教工作资料选编(增订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 [8] 孙建玲《中共直南——冀鲁豫地区前期革命史》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第34页
- [9]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编辑组《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1辑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3页
- [10] 中共滑县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中共滑县党史资料选编》(第1辑),1990年,第219页
- [11] 冀南革命斗争史编审委员会《冀南斗争史(1925-1949)》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94页
- [12] 冀南革命斗争史编审委员会《冀南斗争史(1925-1949)》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97页
- [13] 孙建玲《中共直南——冀鲁豫地区前期革命史》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第32页
- [14] 孙建玲《中共直南——冀鲁豫地区前期革命史》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第27页
- [15] 中共大名县委党史办公室《中共大名县党史资料选编》(第1辑)1989年,第160页
- [16]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编辑组《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1辑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9页
- [17]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编辑组《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1辑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8页
- [18]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编辑组《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1辑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6页
- [19] 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工作组《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9页

作者简介: 马忠坤(2000.10—),男,汉,河北省沧州市,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